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石 斌 著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 (1952-19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

(1952—1959)

石 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石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4510-5

I. 杜… II. 石…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现代 ②美苏关系-研究-现代 IV. 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647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made possible par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Publishing Subsidy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前 言

“史鉴使人明智”，^[1]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关于历史知识之价值的一个较为普遍、通俗，然而又相当笼统的认识。虽然人们还赋予专门的历史研究以各种不同的具体目的，或经世致用，或寻绎历史发展的“规律”，或旨在丰富人类的自我认识，或纯然出于个人的智识兴趣，不一而足，但其中大多亦隐含了鉴古知今的意图。杰出的文艺复兴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指出，历史的真正用处不在于使人“下回”变得更聪明，而在于使他们“永远”都比过去更明智。中国人也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甚至认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隆替。

然而，从历史中获取教益殊非易事。一则，对于如何从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恰当的教训，人们往往存在分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察角度出发，得出的教训可能很不相同。再则，即使人们能够就何为某一特定事件的“正确”教训达成共识，在实践中仍不免会进行错误的历史类比，将其滥用或误用于与过去不同的新形势。^[2]这就是说，误解乃至曲解历史诚不免有重蹈覆辙之虞，罔顾现实或者从眼前的需要出发牵强附会，同样也可能犯错误。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冷战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学术界更是兴起一股全面重新检讨冷战史的热潮。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新观点层出不穷，许多过去已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一

时间受到严重质疑。这一方面是由于前苏东国家档案材料的逐步开放以及西方外交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在学术信息资源的层面对过去的研究构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冷战的结局大大增强了美国和西方的自信心，西方人既以“胜利者”自居，看待这段历史的心态便与过去大不相同。美国外交史学界甚至认为冷战史（以及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史）将在或者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写，遂有所谓“新冷战史”之说。^[3]

平心而论，“新冷战史”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例如，强调利用如今已经可以见到的多国档案，进一步澄清基本事实，摆脱“美国中心主义”，了解冷战“另一边”（the other side）的情况，探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寻求方法论的革新，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在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之外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注意意识形态因素乃至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因素的作用，^[4]增加道德维度的思考和评判（当然，笔者认为这一点的前提必须是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而不是仅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尺度）等等，就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描述冷战，推动冷战史研究的学术进展而言，都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潮流起伏一样，“新冷战史”的出现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并非孤立的学术现象，它不仅显示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也是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重新抬头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在学术领域的折射。虽然不能针对具体的研究一概而论，但大致可以认为，全面消解冷战史“修正派”（以及部分“后修正派”学者）过去多少所持有的一点批判锋芒，回到“传统派（正统派）”官方外交史学竭力颂扬美国冷战政策的老路，渲染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和军事实力、政治权势的“优越性”，试图为冷战后时代美国防范、

排斥乃至清除异己力量，扫除全球霸主地位的路障以“重建辉煌帝国”提供历史借鉴，^[5]是所谓“新冷战史”的基本价值取向。

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学家固然不应该歪曲事实，但要他丝毫不偏袒其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则并无必要（在笔者看来，似乎也不大可能）。他还说：“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么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6]这是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但至少也强调了“兼听则明”这个起码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学者所提倡的“新冷战史”，对各国外交史学界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各国学者显然不能自动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姑且不论有关研究所隐含的现实政治意蕴，即便就纯粹的学术意义而言，对于冷战这样一个头绪纷繁、时空跨度很大的主题来说，只有各方面都尽量表达自己的声音，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而言之，人们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发生新的研究兴趣，提出新的看法，往往与当下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客观处境和实际需求有关。今天人们如何认识这段长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中得出怎样的教训——正确的教训抑或错误的“教训”——对于塑造有关国家政治领袖、社会精英乃至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和对外政策观，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曾处于东亚冷战的前沿，在美苏冷战格局中也曾扮演过特殊的角色。中国学者理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场学术争鸣，立足于自身的观察角度，充分利用大量新旧材料，对冷战的起源、性质、影响，冷战时期的重大国际事件以及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和外交决策者的对外政策思想等等，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讨，从中获得应有的历史教益。

本书即是作者就此所作的一个尝试。但作者没有选择研究诸如冷战起源之类的大问题，甚至也无力进行“新冷战史”所主张的多国档案研究或全方位的“国际史”研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美国冷战外交的重要时段，并以杜勒斯这个中国人“耳熟”却未必“能详”的著名“反派”人物为切入点来探讨美国的政策。这种选择当然有自己的一些理由。

首先，我感到有关冷战史或战后美国外交史人物的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创造的，这里所说的人首先是一个集合名词，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某些具体的个人，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原本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伟大的太史公以降，无数的楷模俱在，不用多说。但今天看来，这个传统似乎有式微的趋势，中国史研究如此，国际史、外交史研究尤甚。我们过去一直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在特定的意义上当然自有其道理，但因此以为谈论个人的作用，就有偏爱英雄史观的嫌疑，则未免过于极端，其实事实又何尝如此。久而久之，我们的历史研究，便常常是只议事，不论人，仿佛事非人为，方针、政策也不是人定的。就冷战史和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对外交人物的专题研究，实在少得可怜。诚然，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已经作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别人的研究不等于我们的研究，别人需要解答的问题亦未必是我们的问题。过去不易见到较为完整的决策人物个人文件也是客观原因之一，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资料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大为改善。这种研究现状，无论怎么说也说不过去。

历史或许确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并因而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历史也具有偶然性，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国家间冲突的原因很多，人们一般多强调地缘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等，总之是强调国家间的权势竞争和利益冲突。这当然不错。但其中有没有人的因素呢？或者确切地说，有没有与人类选择密切相关的观念的因素、思想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冷战结束后，人们常常说要摒弃“冷战思维”、“冷战观念”，也就

是说，国家之间要和睦相处，除了要解决好利益冲突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好思想上、观念上、认识上的问题。实际上，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东西，也是主观的东西，一国需要维护哪些利益，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都要由人来决定，这本身就有个认识问题，而人的认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用一个新近很时髦但不无道理的理论术语来说，就是有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冷战思维”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是带着自身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有色眼镜看问题，由此还派生出许多的观念，诸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抱定“恶魔”意象，追求绝对安全等等，但本质上仍然是个思想、观念问题，进一步推究，甚至可以说也是个文化问题、哲学问题。要完全理解政治领导人及其所代理的国家的对外行为，除了研究客观的物质因素，还必须研究政治人物的思想、观念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这个层面上所做的讨论，自然不免也会打上研究者个人主观认识的烙印，但这未必就是件坏事。笔者认为，认真细致地钩沉史料，忠实客观地描摹事实，与研究者倾注其间的价值判断、社会理想乃至个人情感，未必如一些“历史科学家”所臆想的那般水火不容。战后以来，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趋势或所谓“客观”取向，在推动历史研究之种种“技术革新”的同时，也许也使得历史学逐渐丧失其最具魅力的人文内涵。概言之，历史研究既是一种“技术”——拔高一点，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说是一门“科学”，但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要理解这一点，无需求助于任何一套高深莫测的理论，更无须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只需诉诸常识就够了——因为研究者是人，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人及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

其次，杜勒斯是冷战史和战后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国务卿之一。研究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外交，特别是战后美国对冷战对手的意识形态战略的由来和发展，杜勒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角色。西方政治学和外交史学界对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在过去四十多年来已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对杜勒斯的研究和评价，也相应地为这几股潮流所左右，关于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及其政策影响，仍然歧见纷呈，许多基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仍有利用新近公布的材料继续研究以澄清有关问题的必要。

第三，国内学者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至今仍付诸阙如。虽然举凡研究冷战史特别是 50 年代美国外交的论著多少都会提到杜勒斯，却从未有人对这位著名的——对当时的东方阵营而言毋宁说是臭名昭著的——“冷战斗士”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及其在美国决策机制和外交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许多关于 50 年代美国外交的研究著述在间接论及杜勒斯时，往往有两种情况：或则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纯粹政治层面的认识，用政治术语或情绪化的判断代替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思考（这与杜勒斯曾经被我们视为“最好的反面教员”^[7]，形象一直十分恶劣有关），以新近公布的外交档案文献为基础的立论并不多见；或则不加分析地跟着某些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结论转，而实际上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潮流起伏有其特殊背景，有关杜勒斯的研究状况本身极为复杂，结论也是忽左忽右、莫衷一是。一些西方学者为其研究立场和观察角度所限，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冷战格局下尤其如此。中国学者过去的一些看法既有时代的局限性，也受到材料方面的限制，因而未必全面、客观。如今时过境迁，又有不少档案材料可资利用，利用第一手材料，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出发进行学术层面的独立研究，针对国外有关研究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看看我们过去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以深化我国的冷战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当属题中之义。

第四，研究杜勒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冷战和 50

年代的美国外交。从研究现状看，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作为一项专题研究，细大不捐，既不可能，亦无必要。作者选取“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这个角度作为研究的入口，有两点理由：其一，对苏战略和对苏政策不仅是 50 年代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也是杜勒斯本人用力最勤、谈论最多，并自认为最有发言权的方面，抓住这条主线，不仅可以反映杜勒斯和美国政策之基本和首要的方面，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相关问题；其二，西方学者过去对这个重要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明显的不足，这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战略和政策，由于时势的移易和资料的增加，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对于杜勒斯在其中的作用，更是聚讼纷纭；对于杜勒斯本人的对苏战略观念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则远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和揭示。

最后，作者选择这一课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命意。冷战本身虽然早已结束，但影响深远，单是为避免重蹈覆辙计，也值得后人深入反思，何况历史还具有连续性，它并不因为某些特别的事件便中断所有的情节。冷战已经结束十余年，“冷战思维”却并未销声匿迹，便是很好的说明。对 50 年代这个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的重要环节以及杜勒斯这样一位冷战战略家和理论家在其中的作用作一番深入的考察，对于认识当前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思考和探索国家之间，特别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的大国之间如何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的研究角度是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苏战略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战略的基本轮廓并探明杜勒斯在其中的作用。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作为“冷战战略家”的杜勒斯，而不是作为外交活动家的杜勒斯，因此分析的重点在

战略的层面和决策的过程上。为此将在三个层次上展开论述，也即回答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1）杜勒斯本人对苏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涵是什么？（2）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3）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基本面貌（缘起、发展、内容和实质）和实际效果如何？

为此首先要遵循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充分利用大量新旧档案材料，俾使本书的论说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力求言必有据；同时由于论题的性质（既是外交政策研究也是人物思想研究）和材料本身的限制，^[8]作者的论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是阐释性的（interpretive），即从本书提出的问题出发，对已经公布的材料重新梳理并提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鉴于杜勒斯是一个思想比较复杂且颇有争议的人物，其言论即使在当时也常常引起误解和争论，其中有些争论本来就是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所致，这一弊病在西方 80 年代以来的一些翻案文章里也依稀可辨，结果翻来翻去难免仍旧使人将信将疑，不得要领，因此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作者有意原文照录，不欲率意曲解。另外，考虑到本书研究范围内的有些背景和细节已为专业人士所熟知，且有若干争论和旧说在前，因此有些章节（如第五、六章）没有采用编年史的叙述方式，而是针对有关研究的一些流行观点和研究缺陷，从问题出发来集中进行讨论。

“导论”是一个学术史研究，既是对国外研究现状的总结，也是对选题的论证，并引出上述问题。鉴于有关的学术论争极为复杂，本书打破一般论著扼要介绍（甚至根本不介绍）研究现状的写作常规，用较大的篇幅来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情况，目的是使此项研究有一个更清晰的学术史背景，以便有的放矢，更好地彰显作者的研究意图和观点。

第一章讨论杜勒斯的苏联观和对苏战略观形成的早期思想背

景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第二章从“新面貌”战略的制定过程入手，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战略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杜勒斯在其中的作用。

第三章集中考察美国对苏战略的一个特殊侧面即针对苏东部局势的“演变”战略和相关政策的由来和发展，并探究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论与此种战略选择之间的关联。

第四章讨论 50 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苏战略上的内部分歧和政策调整的情况，着重揭示杜勒斯在争论中的立场及其困惑、摇摆的根源。

第五、六章研究美国对苏战略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前一章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局部缓和意愿的反应，对缓和、裁军、四国首脑会晤等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及杜勒斯在有关问题上的态度和影响，揭示美国对苏战略和对苏政策的实质与后果。后一章通过研究此间影响美苏关系的主要欧洲问题，包括美国构筑欧洲集体防御体系、重新武装德国的努力以及对柏林危机的反应，进一步揭示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对苏战略的实质和美国政策所面临的困境。

本书所利用的原始档案材料主要有三类：

1. 未刊档案文件。有两大来源，其一是操于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玛德手稿图书馆（Seeley Mudd Manuscript Library）的有关文件：（1）杜勒斯个人文件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JFDP)]，其中利用较多的是 1953 年以前的早期文献，包括杜勒斯的一些演讲、声明、证词、文章等等，这些文件对于了解杜勒斯的早期思想很有帮助；（2）新近开放的杜勒斯任内的部分美国国务院文件微缩胶卷 [John Foster Dulles State Department Microfilm (1953—1959)]。其二是藏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的文件，其中包括杜勒斯文件、艾森豪威尔总统文件、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文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等等。

2. 已刊档案文献。主要是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编辑出版的大型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FRUS*），其中利用较多的是历年的“国家安全卷”以及关于苏东地区、柏林危机等方面的专题文件集；此外，还包括《美国国务院公报》（*DSB*）、《美国总统文件集：艾森豪威尔》、《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国际事务文件集》（英国）等。

3. 前苏东国家档案材料。本书的研究重点和叙述角度是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决策过程，因此主要引用的是美方的材料。但在涉及苏东地区的一些具体事件时，也参考了国外学者近年来收集整理的一些极有价值的苏东国家档案材料。国外学者根据苏东国家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论文和专题研究对笔者也有不少启发。苏东地区的档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陆续开始公布，虽然相对于西方的材料而言仍然有限，但由于反映了以往鲜为人知的苏东方面的情况，已经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学者利用这些材料作了许多非常精细的专题研究，一些重要的档案文献也陆续在西方结集出版，例如，1992 年开始出版的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D. C.

注 释

[1] 《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80 页。

[2] 参见 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3.

[3] Peter Kindsvatter, "Report on the Temple University: Exploring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 Newsletter*, Vol.26, No.4 (December 12, 1996): 12-19;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Washington, Dec.29, 1992, *Diplomatic History*, Vol.17, No.1 (Winter, 1993); Idem, “On Moral Equivalency and Cold War History,” in Joel H. Rosenthal, ed.,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eader*, 2nd ed., Washington, D.C., 1999, pp.194 – 217; Idem,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address at 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 History Institute on “The Cold War Revisited”, May 1 – 2, 1998, reprinted in *American Diplomacy* (Online Journal), Vol. 3, No. 4 (Autumn, 1998).

[4] 这主要是针对那种单纯从政治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地缘政治和传统国际权势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冷战的研究取向。

[5] 参见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6]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2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8] 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一些据估计具有重要潜在价值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涉及杜勒斯生前最后几年的文件（新近出版的 *FRUS 1958—1960*，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以及一些重要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设计部（The NSC Planning Board）和杜勒斯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 Staff，国内有多种译法，如“政策设计司”、“政策设计委员会”、“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文件等等。最新公布的一批文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开放的部分杜勒斯任职时期的国务院微缩胶卷，也有重要利用价值，但据笔者研究，大部分是关于东亚问题的文件。另外，杜勒斯为美苏会晤或谈判起草的背景材料和谈判方案对于深入了解一些具体问题据估计也有重要价值。

目 录

前言	(1)
----------	-----

导论 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1)
------------------------	-----

一 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	(2)
-----------------------------	-----

二 众说纷纭的个案	(11)
-----------------	------

三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15)
--------------------	------

四 思想方法的解读	(20)
-----------------	------

五 问题的提出	(24)
---------------	------

第一章 “苏联挑战的性质”与美国—西方的战略	
------------------------	--

——思想背景溯源 (1919—1952)	(47)
----------------------------	------

一 “和平变革”之政治哲学	(49)
---------------------	------

二 对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挑战”	(55)
-----------------------	------

三 以“压力”促“变革”	(71)
--------------------	------

第二章 对苏基本战略：在“遏制”与“解放”	
-----------------------	--

之间 (1952—1955)	(100)
----------------------	-------

一	党派政治与外交政策：“遏制”之上抑或“遏制”之外？	(101)
二	“安全”与“繁荣”之双重目标	(110)
三	“光照室计划”与 NSC162/2 号文件	(120)
四	“报复”乎？“威慑”乎？	(135)

第三章 对苏东的意识形态战略：从“激变”到

	“演变”（1952—1956）	(157)
一	“解放”口号的实践内涵	(159)
二	初露端倪：对东德骚乱的“政治反应”	(165)
三	NSC5505/1 号文件：“演变”战略正式出台	(180)
四	波匈的检验：“演变”战略完全定型	(187)
五	“演变”战略的实质	(197)

第四章 战略重估与微调（1956—1959）

一	“报复”战略的逻辑困境与现实障碍	(215)
二	政府内部的分歧与杜勒斯的摇摆	(219)
三	有限的政策调整	(237)

第五章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的困境（上）

一	“和平的机会”与美国的消极态度	(266)
二	谈判的限度：缓和、裁军、最高级外交	(283)

第六章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的困境（下）